

吴敬琏 马国川 著

重启改革议程

—— 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

第三版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吴敬琏 马国川 著

重启改革议程

——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

第三版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 / 吴敬琏，马国川著. —3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4
ISBN 978-7-108-05685-6

I. ①重… II. ①吴… ②马…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IV. ①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4054 号

特约编辑 贾宝兰

责任编辑 叶彤

装帧设计 罗洪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2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3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8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0.75

字 数 266 千字

印 数 120,001—127,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二版序

本书自 2012 年底面世以来，受到读者的热情关注，成为 2013 年的畅销书。这本书有两项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对改革全过程的梳理，分析为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二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我们的回答，指出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乃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这两个议题，都引起了众多读者的热烈讨论。

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两个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大事件：第一，201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第二，2013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

这两大政治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中共中央对于本世纪初期以来一直在激烈地争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作出的正面回答。

由于《重启改革议程》这本书讨论的主题正是“中国向何处去”，在中共中央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的背景下，本书的出版者决定重印一个新的版本，也就有了新的意义。

从 19 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曾经多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拿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来说，这一“天问”，也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出过多次。只不过这一次是在

中国进入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门槛前发生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是否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因此，问题久悬不决，就格外使人感到焦虑。

正如《重启改革议程》一书所说，中国在 20 世纪末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一方面市场交换成为主要的交易形式，这大大促进了民间创造精神的发挥，成就了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另一方面，它又还没有能够摆脱旧的命令经济体制多方面的影响。甚至市场运作本身，也处于政府的控制和“驾驭”之下。所以，这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性的体制。这种体制存在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是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加强国有部门的“控制力”，演变为威权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十有八九会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

在这两种前途和命运之间，中国应当何去何从？以此为焦点，从本世纪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社会的大争论。

在争论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后一种主张利用大众对腐败猖獗感到严重不满，却对造成这种情势的深层原因不甚了了的状况，用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把他们引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歧途，曾经造成了一定的声势。一种先被叫作“北京共识”，后来以“中国模式论”闻名的观点宣称，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优异成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以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强力管控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力地贯彻国家意志。至于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乱象，在这种观点看来，责任完全不在政府工作“越位、错位和不在位”（即“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和自己管不好的事情，许多政府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而是由于受到市场力量的掣肘和冲击，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还不够全面和有

力。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应当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强化由强政府、大国企和用海量投资拉动 GDP 增长的发展模式。

在《重启改革议程》一书中，我们力求客观深入地分析中国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探寻造成社会弊病的体制性原因和克服这些弊病的正确路径。在这种研究中，我们得出了与前述观点完全相反的结论。事实说明，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才能得以释放出来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 30 多年强劲增长的根本原因。我们深信，面对着由于改革停滞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只有重启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本书在社会上受到的热情欢迎表明，成千上万的读者与我们心心相印。特别是随着 2011 年以后被“中国模式论”者歌颂备至的“高铁奇迹”“重庆奇迹”等真相的陆续暴露，威权发展主义造成的消极后果的逐步显现和“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走向深入，愈来愈多的人们认识到倒退没有出路，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推进改革，成为普遍的呼声。

这样，在有识之士的合力推动下，中共十八大不负众望，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尖锐问题作出了“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明确回答。在经济改革方面，十八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十八大也重申了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要求。

当然，宣布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改什么”和“怎么改”。如果不能够制定缜密的改革方案，设计可行的改革路线图，那么改革很有可能启而不动，或者在推进过程中被扭曲变形。针对这个问题，2012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要求在 2013 年“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的一年，官、产、学各界和许多个人，围绕改革的总体方案设计展开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仅就学界而言，参与的既有体制内研究单位，也有民间学术团体，既有国内学者，也有海外专家。这种广泛参与改革设计的现象在 35 年的改革开放史上也是罕见的。他们以问题为导向，对于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爬梳剔抉，找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性原因，列出需要改革的项目，然后按照体制的领域开列出需要进行的改革项目清单。

据统计，共有 118 份意见和建议汇集到中央。中共中央在 2013 年 4 月下旬建立的文件起草组梳理出改革总清单，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之后，11 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对 2014—2020 年期间的改革作出了总体设计。

首先，《决定》进一步阐明了十八大对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定位。正如《重启改革议程》中所说明的，“中国向何处去”大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应当如何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决定》所作的说明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决定》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时，也重申十八大中央委员会《报告》的提法，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十八大《报告》有所不同的是，《决定》没有停留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上，而是针对过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越位过多的情况，对怎样才叫“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各级政府应该执行哪些职能，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这就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

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为此,《决定》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决定》还明确提出,“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以外的领域”。

第二,《决定》不但态度鲜明地宣称“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而且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要求通过全面改革,把这个制度基础建立起来。

显然,这一决定吸收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现有经济体制的沉痾旧疾开出了正确的药方。

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抑制了市场应有作用的发挥,中国的现行制度存在一系列严重缺陷:一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条(部门)块(地方)分割”,对市场“切块、切条、切丝、切末”,造成了市场割据的形成和市场的“碎片化”;二是没有对各种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地开放,使它们能够在同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三是由于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的广泛存在和反垄断执法软弱无力,使市场丧失了必不可少的竞争性质;四是市场无序,法治未立,不能保证市场交易在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五是各类市场的发育程度参差不齐,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尤其低下,严重妨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在以上列举的制度缺陷中,核心的问题是市场缺乏竞争性。自由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因为只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才能够形成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和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近些年来由于政府不断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使权力而不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失去自由竞争的市场只能是一种貌似市场的“伪市场”。要建立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为了建设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官、产、学各界提出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我在早些时候把它们概括为以

下七个方面：（1）明晰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2）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取得生产要素；（3）实现商品价格和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完善竞争政策，消除严重妨碍市场运作的地区保护和行政垄断；（5）按照“市场能够办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够办的交给社会”的原则，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禁止各级政府介入营利性活动；（6）克服司法地方化倾向，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确立法治；（7）禁止以“宏观调控”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市场监管要以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由实质性审批为主转向合规性监管为主。

以上这些改革要求，几乎在《决定》里都得到了覆盖。《决定》提出的具体改革的项目多达几百项，它们都是围绕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总纲部署的。因此，如果纲举目张，《决定》所要求的改革项目都得到落实，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有望成熟起来，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了。

但是常言道，“知易行难”，设计总体方案固然不易，实施总体方案更是一场硬仗。

和以前的改革比起来，这次改革的范围更广，要求更高，必然会面临重重障碍和实际困难。阻力和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来自旧意识形态的阻力和障碍。由于我国在前30年中一直实行苏联体制，从苏联引进的那套理论对中国影响非常深刻。虽然许多年已经过去，许多人至今还没有能够摆脱那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

另一方面，是来自既得利益的抵制和阻挠。体制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在这种调整中，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千方百计抵制和阻挠。

除了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阻挠，体制转轨也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旧体制各环节之间虽然也有许多矛盾和不协调，但是经

过多年的运转，它们相互之间多少是互相配合的。当其中某几个环节被改变，原有的体制运作不下去了，于是就会发生一些实际问题。例如目前全国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过高，一些地方政府长期靠借债度日、靠卖地支撑，一旦实现利率市场化，强化预算硬约束和土地确权，就会发生范围或大或小的偿债问题。如何在对资产负债表“消肿”的同时，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防止对全面深化改革造成障碍，就成为宏观经济当局的重大课题。

在改革执行上的另一个困难是，目前积累起来、需要通过改革加以消解的社会经济问题很多，可以说是“百革待举”，2014—2020年间需要进行的改革项目多达数百项。考虑到我们手中能够用以支持改革的资源是有限的，决不可四面出击，分散力量。按照过去改革的经验，较好的改革策略，是将改革划分为若干循序推进的阶段，然后根据各种改革项目的重要性和关联度，筛选出少量关键性的改革项目，组成各个阶段的“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集中力量打开灭战。这样，各项改革就能够较快地发挥协同效应，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也使大众能够直接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

总之，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反对向旧体制倒退；另一方面，要提高专业素养和运作艺术，去解决体制转轨中的实际困难，促使改革与发展早日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新一轮改革更是强调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行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中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现在，这一轮改革已经启动。我们希望，《重启改革议程》这本着重剖析中国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探求救治之道的对话录，对于走好下一步改革征程有所帮助。

吴敬琏 马国川

2014年3月12日

原 序

这本书从2010年5月份开始写作，到2012年10月份完稿，12月初第一版出版，书名为《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本书出版以后旋即销售告罄，现在借出版社调整字号和版式、重新出版的机会，我们把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并借新版的机会对读者讲几句话。

在本书写作的时间里，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争论正在激烈地进行着。这场大争论的核心，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在20世纪末宣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决。由于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旧体制遗产的严重存在，现有的体制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质：它既包含新的市场经济的因素，又包含旧的统制经济的因素；既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又可能通过统制的强化，回到旧体制去。在改革停顿，甚至倒退的情况下，权力寻租和贫富分化变得日益严重。这些年来，有着深刻历史渊源的极“左”势力就利用这种形势，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蒙骗大众，掀起强化国家权力和行政控制，从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倒退的风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本书正是在这场争论的背景下写作的，对争论涉及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回应。我们力求深入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各方面存在的矛盾，探索克服弊病、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种分析和探索使我们深信，只

有重启改革议程，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当本书完成付印之时，社会各界企盼已久的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到底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从经济改革来说，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政治改革来说，则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提到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十八大以后，全面推进改革的呼唤迅速升温。现在的问题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和号召推进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改革，还有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根据我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实现全面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这就是：第一，确定改革的目标（现在的说法叫作“顶层设计”）；第二，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关系，制定出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为什么改革需要进行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既复杂又精致的巨大系统。要构筑这样的系统，不能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也不能由各个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施工和设计，然后将它们拼凑成一个体系，因为这样的体系是无法协调运作的。

因此，目前朝野上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基层创新的支持之下，由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改革领导机构牵头，进行重点改革项目的方案设计和改革的总体规划，也就是最近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工作提出的要求：“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根据以往的经验，无论是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总体规划，还是

执行这些方案和规划，都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需要官、产、学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

难得的改革窗口期已经开启，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在本书中作出的分析和提出的主张不一定全都正确。我们只是希望，无论是同意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看法，还是反对我们的意见，只要这本对话集能够对读者在积极参与改革、深入思考有关问题时有所帮助，我们就算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吴敬琏 马国川

2012年12月18日

前言

199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的那段著名的话来描绘当时“两头冒尖”的经济和社会景况：“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种“两头冒尖”的状况却似乎愈演愈烈。

从一方面看，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三级跳：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低中等收入国家，再进一步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人口众多，体量巨大，它在全球事务中的分量也变得举足轻重，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新星。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图景却远不是那样美妙亮丽。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且不说现行体制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也呈现出一种缺乏规则和权力多方干预的“原始”

状态。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多方面的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不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使经济活动和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威胁、愈来愈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来维持 GDP 的增长，使资产泡沫形成和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等旧疾牵延未愈，腐败活动愈益猖獗，侵入社会肌体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各种矛盾趋于激化，社会面临破裂溃散的危险。

对于这种两极共生现象的存在，多数人都是承认的。但是，对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现象以及出路何在，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种先被叫作“北京共识”，后来以“中国模式论”闻名的观点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是：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的成绩，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具有一个以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的强力管控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力地贯彻国家意志，因而能够创造北京奥运、高铁建设和一些地区 GDP 连续两位数的增长等“奇迹”。而且由于它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继续保持 GDP 的高速度增长，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支持，应当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各国的楷模。

至于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乱象，在这种观点看来，却是政府的掌控还不够全面有力，“举国体制”的执行还不够坚决彻底，因而市场自发力量还能够干扰国家意志的贯彻。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应当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强化这种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拉动 GDP 高速度增长的发展模式。

我们的看法和上述观点完全相反。

只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前 30 年和后 30 年的情况做一番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模式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获得的良好成绩所作的解读，是完全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说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强力管控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那么，

在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中，中国拥有一个较之当下更强势的政府和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为什么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就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生命的人间惨剧？相反，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后 30 年和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前 30 年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进行了改革。在原有的所谓“榨取性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之外，以开放市场为前提的所谓“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也开始出现。

30 多年来，虽然各个领域改革的推进程度并不相同，且原有的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在一些重要领域保持未动，但这一轮改革毕竟使一个也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局部地建立起来。

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被落后制度所束缚压制的生产力，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这具体地表现为：第一，改革为民间创业开拓了活动空间，使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 20 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 3000 多万户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的最基础的推动力量。第二，市场的开放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使大量原来无法流动的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从效率较低的经济活动流向效率较高的经济活动。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使中国能够利用发达国家储蓄率过低、投资缺口过大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产出的高速度增长。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人力资本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开展起来的条件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应用层面上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几百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于中国改革

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20 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造成的。

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state sector，包括国有经济和国家党政机构）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经济活动总量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commanding heights），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制度缺陷造成了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中国迫切需要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迟迟不能实现，因此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变得愈来愈严峻。第二，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造成了普遍的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不可扼制地蔓延开来，深入到党政组织的肌体之中。

这一切足以说明，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 30 年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所在。改革和一切社会演变相同，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不能将市场化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不但旧体制下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痼疾得不到消除，在经济效率由于前面讲到的生产结构变化和“适应性创新”而有所提高以后，随着城市化进入后期和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与外国产业技术水平之间落差的大幅度缩小，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支持有效率增长的来源，原有的生产率提高的势头也无法保持。这样，中国就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特别严重的是，由于本世纪初期以来改革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倾向，这就使中国现行的“半统制、半市场”混合体制的消极方面更加强化。

事实上，这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一旦建立，就只